第 56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6, No.2
2019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19

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杨　河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自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期待,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之成为一种天赋的平等权利,但是私有财产在占有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法权与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裂口,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指向了人类解放,它取决于“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对这个“历史之谜”的解答贯穿在马克思全部理论研究中,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关键词: 自由;解放;异化;私有财产;分工;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2-0001-05

《1844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名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

马克思讲的“历史之谜”,就是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解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实质上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对自由的向往由来已久,与生俱在,为什么却又是“历史之谜”? 卢梭之前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个“注释”——“人是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卢梭对此的解释是:人之初,生活于自然状态,遵循人性之自然法则的自爱心和怜悯心两个原则行事,享有天然的平等和自由。由于人拥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必然会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又由于这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个人身上的体现不是一样的,又必然会带来财产、知识以及技术不平等,为了避免冲突和对抗,人们不得不彼此订立契约,“转让”自己的权利以建立国家政权,然而社会不平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随着文明的进程不断加深,财产、知识以及技术等文明的产物奴役了人,国家权力在维护私有制的运行中逐渐演变成为暴君专制,社会不平等发展到顶点,自由消失了,人饱受套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枷锁的奴役,“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③。这种“背离”,就是人们在卢梭著作中读出的“异化”。

卢梭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个新制度的意识形态,在马基雅维利、格带秀斯初步提出的人性论假设、自然状态假设和社会契约论假设基础上,霍布斯、洛克进一步论证了新的政治学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生命、自

收稿日期:2019-01-20

作者简介:杨河,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0 页。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 页。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4 页。

由和财产是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要求,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否承认和尊重这些自然权利,是衡量社会公正与否的基本尺度;第二,一切政府的统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广泛同意的情况下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政治社会和法律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增进每个人的幸福。

这两个基本原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合理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它们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却显露出深刻的矛盾:这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对立。自由意味着人人都因为具有不可被剥夺的平等权利而独立自主,但是权利在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根本的问题是私有财产,财产占有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可以运用的权利的大小。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卢梭较早地洞察到了没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①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公民事业真正保证”“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重要”②;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权是穷人和富人“这两个阶级的人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条款,可以概括几句话:你需要我,因为我富而你穷”,③断定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责社会把这种不平等变成合法的权利实质上是保护富人损害穷人的利益,要求用暴力推翻暴君的统治,订立新的契约,建立一个“既不许有豪富,也不许有赤贫”④的国家。

卢梭的批判所指,直接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但是他对进步的质疑,又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当孟德斯鸠、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还在大张旗鼓批判封建制度与宗教神学,为理性与资本主义文明鸣锣开道的时候,卢梭已经在批判理性和资本主义了,列奥·施特劳斯说:“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让-雅克·卢梭的思想中。”⑤卢梭也因此被视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早产儿,尽管他认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⑥,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一场堕落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还是在客观上为人类走出异化预设了方向,成为马克思对历史之谜思考的重要借鉴。

卢梭的批判客观上揭示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各种迂回、曲折甚至某些倒退中实现,这种规律性特点在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成为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解历史的重要根据,从而推进了对人类解放的认识。康德、黑格尔将启蒙精神分别融入自己哲学体系,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论证了人类实现自由的历史是善与恶、特殊意志与普遍理性之间矛盾运动使然的辩证发展过程,客观上阐释了人类解放的历史道路问题;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将人的主体性利己化为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分工的理论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思想,论证了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引导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的同时促进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客观上阐释了人类解放所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问题;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将“自然法”现实化为价值尺度,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以及私有制产生阶级和剥削等观点,论证了未来社会的种种新的特征,客观上阐释了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问题。

但是,财产权的问题仍然未受到根本的批判性的审视,正如马克思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66 页。
②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5 页。
③ 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第 36 页。
④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 66 页。
⑤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57 页。
⑥ 卢梭:《忏悔录》,第 2 部,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68 页。

生出来的。”①德国古典哲学从人的自由意志来解读财产权,或者视之为“法权法则”(康德),或者视之为“自由的定在”(黑格尔),也都不过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②。空想社会主义者倒是直接批判了私有制及其现实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但是,这种理论还是不成熟的,只是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其社会理想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如何科学地阐释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是揭示“异化”根源,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即奠基于此。

二、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大学期间,马克思先有兴趣于康德哲学,后转而关注黑格尔哲学,希望在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中找到解决在康德、费希特哲学中存在的理想与现实、应有与现有之间矛盾的原则。此时的德国在法国大革命的催动下,正孕育着走出普鲁士封建制度的历史变革,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参加了有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倾向的青年黑格尔派。

大学毕业后到《莱茵报》工作,透过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关于摩塞尔地区农民状况的辩论,马克思看到了社会上不同集团不同等级的对立根源于物质利益的对立,认识到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而应该从“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③来解释一切,对自己所信仰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法哲学产生了怀疑,陷入苦恼之中。这一时期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神学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论错误的分析建立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提供了重新认识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武器。

1843 年 3 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来到克罗茨那赫,“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④试图从对欧洲历史和法国大革命有关资料的研究来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肯定“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⑤,但是指出他颠倒了现实和理念、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双重的错误,确认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据此,他批评了黑格尔在谈到长子继承制时,认为政治国家支配私有财产的看法,指出:“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⑥因此,解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的途径就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理念内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批判和超越:一方面,要对市民社会进行改造,使人从市民社会的利己的个体存在回复到“社会化了的人”本身存在;另一方面,要对政治国家进行改造,使之从君主制转变为“人民的国家制度”的民主制⑦,从而“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使各个特殊领域本质“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⑧

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还处在向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他对现实问题特别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为什么分离以及如何扬弃这种分离的论述还很抽象,潜在于这些论述中的人类解放问题主要还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方向上处理,但是,批判对象的重要性决定了批判意义的重要性,“德国的国家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8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1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2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9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2 页。

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仅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①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财产权这个市民社会的基础和现代政治学的核心原则进入了马克思的批判视域,这正是他认识“历史之谜”的切入口。

1844 年 2 月马克思与卢格合办了《德法年鉴》,旨在解决由于德国专制制度的“强力的压制”而导致的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上的“思想混乱”,“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②这种努力首先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文章讨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与德国前途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政治解放?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一切人放弃宗教看法,马克思认为,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内的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不再信奉任何宗教而仅仅信奉自身,但是“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③,因为“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④,通过政治解放而确立的“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而“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因此,“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同样被看作孤独的单子”⑤。

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⑥,它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相互异化,而是在人的二重化存在中完成了这种异化,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个体的私人进行活动,脱离了类的普遍性,而在国家之中,人作为抽象的类存在着,脱离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被赋予非现实的普遍性。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⑦克服政治解放的不足即是人的解放的任务,这就是最终“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

“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持久的,才能做到这一点”⑨。对德国来说,实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⑩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主动的因素即理论的条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⑪ 二是被动的因素即物质基础条件,即“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⑫。

《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思想的继续,尽管带有较多的费尔巴哈人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7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2、18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0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74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9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75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0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7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13 页。

主义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满意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①。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国家观的批判,马克思深入到了“市民社会”这个现实基础,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社会力量,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形成对“人类解放”这个历史之谜解答的理论雏形,基本的看法就是走出私有财产及其政治权利这些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建立较之资本主义更为合理的社会。

三、从“人”的解放到“工人解放”

当然,思想的转向还并不意味着新思想的诞生,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完成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他对人类解放的理解,还囿于较为抽象的“人”的解放,没有深入到人的历史活动的根本,其重要原因是,《德法年鉴》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 1843 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留下了著名的《巴黎笔记》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一种与以往研究相联系的过渡,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仍然具有较浓厚的哲学批判性质,主题即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私有财产”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追问,在莫泽斯·赫斯思想的影响下,这一追问与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行动结合了起来。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确认劳动是财富(价值)的来源,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③,即它并非抽象意义上个人意志对物的支配权利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④

但是国民经济学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特别是没有深究“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它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没有考察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反而刻意掩盖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状态,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并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后面的真实规律,它将财富理解为“一般劳动”也就意味着将财富理解为“完成了的劳动”即资本,“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⑤,于是,资本成为私有财产的最高形式而“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⑥。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有过深入的研读,确认劳动是人的本质,并通过劳动促使“主奴关系”转化的分析,论证了劳动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重大作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看法,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⑦但是批评了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和“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错误,揭示了劳动在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及其与私有制的联系,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⑧,“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会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⑨

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内在关系的揭示,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8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6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0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0 页。

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直接谈到人本身。”①一旦从劳动来理解私有财产和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发现,“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②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构想,认识到了生产劳动的支配作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③他确信,“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进一步的结论是:“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⑤

从之前将人类解放理解为“人”的解放,到将人类解放首先理解为工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解读的重要一步,这不仅开始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也开始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早期主张平均主义地分配现有财产的共产主义学说,只是“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⑥

而从工人解放来理解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则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是马克思对历史之谜解答的主题思想,其内在要求,是既要从根本上消除私有制赖以产生的一切旧的社会条件,又要利用私有制长期发展中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中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新的社会条件。

但是,《巴黎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还是在进行中并没有最后完成,马克思也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认为“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⑦。因此,通过工人解放最终达到的人类解放仍然被理解为向“人本身”的复归。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还没有完全走出旧的“异化”思想的束缚。

“异化”(alienation)一般是指主体在自身发展中,产生了相异的对立面,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奥古斯丁的“救赎”说中,已经有了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解读,17、18 世纪的一些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用社会契约的观点讨论国家权力的起源时,将异化看作个人权利的转让、让渡,赋予了异化以现实内容,然而真正使异化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批判意义的思想家还是卢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0—12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0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19、117、118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46 页。

受卢梭思想的影响,黑格尔将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的主体能动性原则与卢梭“文明造就人类痛苦”的主体否定性原则结合起来,发展出主体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把绝对精神的发展描述为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异化回到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将人理解为在对象化劳动中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将世界历史理解为在历经各种奴役走向自由的过程,赋予异化历史以新的思想逻辑。费尔巴哈恢复和发展了法国唯物主义,将异化的主体还原为感性的人,将宗教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将唯心主义理解为宗教异化的哲学形式,又赋予了异化理论以新的感性内容。

被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发展了的“异化”概念,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批判内涵,成为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宗教、政治、社会批判的重要思想武器,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但是异化概念在原有形式上是不适合马克思正在形成的新思想的本质要求的,这主要在于,它的基本特征是设定一种“原始主体”“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因而解放总是被理解为一种具有逻辑预定意义上的“复归”,在卢梭那里,这个“原始主体”是自然人性、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费尔巴哈那里则是人的“类”本身。写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类)批判和取代了黑格尔的“抽象”的人(自我意识),但“主体”的“逻辑在先”性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批判性审视,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的完成,从私有财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是人对异化的根本解脱,这将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这个看法,基本上还是费尔巴哈的思想,其共同点是:扬弃人作为利己者的个体性存在,回复到人作为“类”的社会性存在,从而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在写作《巴黎手稿》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他还没有完全走出旧哲学的藩篱,现实的人及其异化劳动还“游离”在人的“类生活”之外,这就很难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为什么“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的矛盾,紧接着《巴黎手稿》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的《神圣家族》和《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继续深化了已有的认识,在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和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研究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②的秘密,要求社会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③另一方面认识到生产力作为属人的力量所具有的重大历史观意义,它不仅是增加财富的因素,也是人的劳动存在于现实工业中的力量和为人创造生活条件的力量,还是无产阶级“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④的力量。

据此,马克思对之前关于理想化劳动与现实化劳动关系的看法做了修正。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虽然承认现实的异化劳动的历史作用,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⑤,但是更强调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非异化的亦即自由自觉状态中的劳动,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转而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不是理想的生产而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才是真实的“历史的诞生地”,⑥“工人才创造了一切”,⑦从根本上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3—1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5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7、128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5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 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在《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写到,在劳动物化为私有财产的历史阶段,"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②。这些研究,使马克思更为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他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得出了"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③这个重要结论,它表明,"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④。

1845 年—1846 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 写作的《哲学的贫困》和次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作。通过对分工所导致的自然经济向一般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历史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和现实前提,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⑤在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为完整也更为准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人类解放的"历史之谜"得以澄清,其中,马克思对分工这个"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⑥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发展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分工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分工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⑦另一方面,分工又是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形式,也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⑧。

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形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⑨ "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⑩"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⑪

于是,过去思想家所迷茫的种种"异化",在分工的发展历史中都可以得到如实解答,"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⑫ 以往思想家所"塑造"的那种"本真"意义上的"人",实际上是"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分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8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25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6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1—17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9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48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3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3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3—164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5 页。

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①因此,“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是存在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②马克思后来对“异化”概念的使用,正是基于这一新的认识之上。

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分工所蕴含的矛盾,文明巨大进步在这里所呈现出的,一方面是人类交往活动总体力量的“成倍增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③,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④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个体存在不断片面化,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⑤的同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⑥

相对于过去时代,世界历史的形成大大推进了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实现自身解放的进程,资本主义开启了这个进程但却不能完成这个进程,它只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即“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⑦

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就在于,分工所表现和推动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⑧于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⑨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0—2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8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9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 1995 年版,第 511—512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6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6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2—413 页。

四、从“副本”的批判到“原本”的批判

唯物史观对分工规律的揭示,阐明了人类解放的客观历史依据,它如何实现? 还有待于对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经济学解剖的完成,在这之前,唯物史观“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①“马克思在 40 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 25 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②

经济学的研究直接针对的是“原本”即资本主义现实,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的问题是解读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关键,马克思在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创立劳动二重性这个“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③的理论、完成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劳动过程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④。

从表面上看,劳动力的价值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权利平等的“契约”关系的产物,这种“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的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⑤,但是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被流通中的“自由”和“平等”所掩盖着的剥削关系便真实地显露了出来,“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⑥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⑦其运动过程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资本积累,这是资本规模扩大、社会财富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不断增大的过程。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一个“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与此相统一的是人的发展及其社会形态在历史中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个性⑨的递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与人的解放和发展在历史过程中融为一体,“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⑩

因此,马克思批评了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针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主张而表达出的伤感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3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76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99—300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07—108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12 页。

主义,指出:“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①

制约这个历史过程的,无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视域中,这也是时间节约规律使然。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上,“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可能少的价值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可能丰富的物质财富。”②因此,“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③另一方面,在人类自身的发展上,与自然界的时空结构不同,社会历史的“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因此,“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⑤

时间节约的要求和趋势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改变的只是它的实现形式,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通过时间的节约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私有制和阶级形成了,“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⑥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⑦

于是,由分工和私有制带来的对立在这里表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⑧资本主义在推进这种对立的同时也为解决这种对立创造了充分的可能性条件,“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了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⑨

在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完全消灭了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⑩ 一方面,“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⑪ 另一方面,时间的节约不再通过价值规律间接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被人们自觉掌握和运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3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2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9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6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216—217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86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23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4 页。

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

时间节约规律,补充和丰富了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对于马克思解答人类解放的“历史之谜”意义重大,它论证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条件——“工作日的缩短”②。

五、从欧洲革命到东方道路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③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提供的对人类解放这个历史之谜的系统解答。在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上,马克思提出了以消灭私有制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则,其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确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④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私有财产的政治堡垒,以往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进而解决私有制的改造问题;第二,“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⑥因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⑦,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⑧

1848 年的欧洲革命和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生前经历的两次不同性质的重大革命,前者是广泛而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者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举,将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在 1848 年革命中所希望的“不断革命”,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⑨但是两次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欧洲大陆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无产阶级也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根据这个新的情况,马克思修改了先前做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的判断,宣告“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⑩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此作了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论断,强调“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⑪,恩格斯 1895 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 1848 年革命重新进行了反思,指出:不断发展着的、“走的更远”的历史,已经改变而且还在继续改变“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⑫但是这并不意味放弃革命,1852 年在致约魏特迈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他对于阶级斗争的“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8—92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92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2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6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003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69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82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 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82 页。

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巴黎公社失败四年以后,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②这是马克思晚年对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和实现条件的重要概括。

巴黎公社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的过程加速,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一方面使得其内在固有矛盾在发展中孕育着更加普遍持久的危机;另一方面又使得其在向世界范围的扩张中孕育着更加深层尖锐的东方西方文明冲突。

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态势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实践中所遇到的新情况使得对于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资本论》写作中,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问题也需要深入探究,由于这些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马克思在晚年对人类历史发展再次进行了回溯性的研究,写下了重要的人类学笔记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信件,其中,对原始社会和东方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在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关系到解开私有制来龙去脉的“身世”之谜,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社会历史的考察研究中,就确信在人类历史的初始时期,曾经存在过非土地私有制的公有经济,针对当时一些人认为原始公有制仅仅是斯拉夫人甚至只是俄罗斯的特有形式的偏见,他写到,“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③但是,对于这种“原始的公有制”的具体组织形式、形成过程和历史地位的认识由于当时缺乏史料的充分支撑还不甚清楚,仅仅是一些推测。

19 世纪中叶后尤其是 70 年代后原始社会研究有了新进展,一大批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相继出版,特别是 1877 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发表的《古代社会》,出现了重大突破。作者根据对古代习俗首先是北美部落的习俗的多年研究,揭示了氏族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证明在原始氏族组织中,不存在着阶级、私有制和国家,恩格斯高度评价《古代社会》,认为“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社会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④

马克思在 1881 年至 1882 年期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并对该书做了详细的摘要和批语,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实现马克思打算联系“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的“遗愿”。⑤

恩格斯指出,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⑥。在这个“重新发现”中,土地公有制被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63、364、36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42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2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2 页。

明是“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①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②通过对摩尔根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客观发展演进过程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梳理和判断,使唯物史观对史前社会的认识也摆脱了假说,成为完整的历史科学,它从人类学方面,证实并扩展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所揭示的历史自身发展在所有制演进上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是人类解放的重要历史学依据。

对东方农村公社的研究,关系到对历史规律表现形式多样性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多种可能性问题的认识。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马克思提出了通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的看法,认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③然而,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却呈现出超出马克思预料的复杂性。

1848 年的欧洲革命和 1871 年的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先后失败以后,在马克思重新考虑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过程中,东方开始酝酿新的危机和革命,其中俄国的问题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其历史背景是: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后,一方面,由于废除了农奴制,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由于还保留大量封建残余,民主革命对于俄国依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的激化下,俄国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态势,如何看待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俄国国内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展开了争论。

1881 年 2 月 16 日,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④在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四易其稿之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指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分析所阐述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⑤

这封复信前的三封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断,他指出,不同于古代公社,农村公社内在的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二重性因素,由此决定农村公社有两种可能结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⑥“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侵入公社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扶植壮大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⑦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6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8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5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82—48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6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72 页。

有俄国革命。”①1882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命运问题的研究,是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探索无产阶级解放即人类解放的道路这个总体问题的一个有机部分,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马克思就对德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应该发生“往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40 年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条件与德国有很大不同的俄国再次进行了“往何处去”问题的研究,尽管较之以前更为谨慎,马克思仍然得出了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有特殊发展的“理论上的可能性”的结论,这一方面表明了马克思对“两个必然”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马克思对之前将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看作是“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的一种修正,认识到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农民阶级的联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民族革命的“互相补充”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马克思作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后来没有变为现实,但是这其中所蕴含的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利用“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④ 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的思想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⑤这是马克思 1847 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批评得出的重要结论,30 年后,针对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发表的曲解《资本论》思想的文章,马克思严肃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⑥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20 世纪上半叶经济和政治危机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文明的基石,引发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和旧制度的革命,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通过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制度,从一国胜利向多国胜利的转化显示出巨大的实践意义。

由于大多数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先前都处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⑦显得尤为重要,列宁因此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⑧,如何高效配置有限资源,让各种生产要素最大可能地发挥作用,成为重大问题。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发生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比较充分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革命的成功,将组成“自由人联合体”⑨,废除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6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第 3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0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4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4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45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21 页。
⑧ 《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97 页。

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的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①

在马克思的这种计划经济设想中,一方面将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决资本主义对时间的"制度性"浪费,使时间的节约在生产力发展"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另一方面将终结社会发展"物的依赖"的历史,揭掉商品拜物教"神秘的纱幕"②,使人类走出"异化"成为现实。

马克思在这里谈的计划经济显然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③首先意识到当下实现这种生产设想的现实困难的是列宁,面对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列宁认识到,"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④"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⑤,"现在一切都在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⑥"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⑦在列宁的主导下,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制,允许自由贸易、允许私人经营一些小工厂,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尽管这一政策开始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工业与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得以重建,工农联盟得以巩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克服了1921年的危机,苏维埃政权站住了阵脚。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探索,他的这些看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最初思考,意义深远。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解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苏联模式"在历史上为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实现、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宏观调控经济经验的积累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经有效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苏联经济粗放式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渐突出,与此相适合的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也一再暴露出来并日益全面化,由于没有实行全面深入的改革,体制走向僵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内在优越性的发挥,逐渐失去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比较优势,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复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主题,经过艰辛的探索,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问题有较早的认识,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批评了一些人试图消灭商品生产的主张,认为这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6—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720页。
⑥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页。
⑦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6页。

“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①“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实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市场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在苏东剧变发生、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最后胜利的喧嚣中,中国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动力,继续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的事业。

“冷战”结束以后,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中长期共存、相互对立、彼此借鉴、各自发展,成为新的国际格局。

这个新的国际格局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规律所支配的现代文明演进之中,资本主义还没有“走完”它的历程,社会主义也还没有充分“展开”它的生命力,人类还没有解决也没有超越马克思当年对现代文明批判中提出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问题,我们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他的“人类解放”理论仍然保存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时代有昨天和今天之分,人类解放的事业也是如此。在时代的今天,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围绕“劳动生产率”的竞争,已经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谁能够更充分地激活和释放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内在的具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期,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持续地从可能转化为现实,不断累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因素,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拓展人类走向自身解放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Marx's Answer to the Mystery of History

Yang He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eedom is humankind's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 of their own destiny.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modern times made it a kind of natural right to equality, but the de facto inequality in the posses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led to an unbridgeable gap between legal rights and reality.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directed to human emancipation, which depends on "the active abandon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or on the human self-alienation". The answer to the "mystery of history" runs through all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tudies, which is the main subject of Marxism.

Key words: freedom, emancipation, alienation, private property, division of labour, communism

(责任编辑　李　铄)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